

AI来了,文科必须改革,但也不必悲观

■郭英剑

这几年,围绕文科的讨论,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尖锐且充满焦虑。

一方面,人工智能(AI)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许多原本被视为文科“基本功”的能力结构。这让许多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科所依赖的一些传统优势正在被削弱,至少正在失去过去那种天然的稀缺性。

另一方面,文科所面临的压力又绝不仅仅来自技术。近年来持续加大的就业竞争、不断收缩的岗位空间、社会评价体系对“即时回报”的强调,都使文科教育的处境变得更加敏感。在此背景下,“文科是否还有必要”“文科是否应该缩减”“大学是否还应大规模保留文科专业”等问题,迅速突破学术边界,演变为一种带有明显情绪张力的公共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争论中,技术往往被想象得过于强大,而文科则被描述得过于脆弱。仿佛AI一来,文科就只能退场;仿佛机器一旦能够生成语言、处理文本、提供答案,人类长期形成的文科知识传统就会立刻失去意义。于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判断开始流行:未来属于技术,文科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

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AI确实来了,文科也确实必须改革,可这并不意味着文科注定衰落,更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轻率地放弃文科。技术改变的是知识生产的方式,却并不能自动回答价值、意义、历史、伦理与文明等问题。机器可以帮助人类更快地处理信息,却无法替代人类理解自身。

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AI时代真正值得认真思考的并不是文科要不要存在,而是在一个被技术不断重塑的世界里,文科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并重新证明其价值。

AI带来的结构性冲击

必须承认,AI对文科的冲击,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且正在迅速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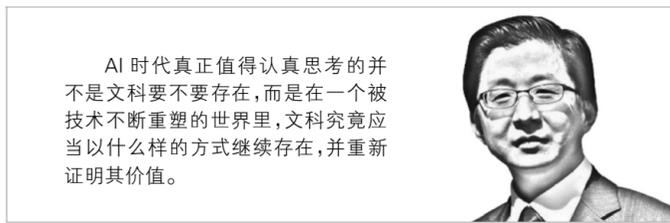
过去,文科的一部分优势,确实建立在语言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之上。写一篇结构清晰的文章、完成一份逻辑完整的报告、进行跨语言表达与翻译,这些能力往往需要通过长期训练逐步形成。它们既是文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文科毕业生进入社会的重要资本。

如今,这一前提正在发生巨变。生成式AI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文本生成、信息整合与初步分析。许多原本需要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能力,正在被技术迅速普及。这意味着,文科中一部分以“表达能力”为核心的训练,正在失去其过去那种天然的稀缺性。

这种变化的关键并不在于机器“是否更强”,而在于能力结构本身正在被重新分配:过去“少数人长期训练后获得的能力”,正在转变为“多数人借助工具即可达到的能力”。一旦这一转变发生,原有的教育逻辑就会受到冲击。

同时,AI也在改变知识获取的方式。过去,文科训练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系统阅读逐步积累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解与判断。而在今天,学生可以通过技术工具迅速获得信息、提炼要点,甚至直接获得“答案”。这使得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文科教学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如果课堂仍然停留在信息讲解与内



AI时代真正值得认真思考的并不是文科要不要存在,而是在一个被技术不断重塑的世界里,文科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并重新证明其价值。

容复述层面,那么它很容易被技术替代,甚至显得多余。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AI不仅改变了知识获取的路径,也改变了知识的内涵。当机器可以生成文本、总结观点、提供解释时,一些原本被视为“成果”的内容,正在失去其评价意义。简单的整理、概括与表达,不再构成真正的学术能力。文科评价体系中的某些标准,也因此被迫重估。

因此,这种冲击并不是局部的,而是结构性的。它不仅作用于某些具体技能,也在重塑文科的三个基础层面,包括能力结构、教学方式和知识形态,分别指向哪些能力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课堂究竟应该提供什么、什么样的产出才具有真正价值。换句话说,AI所带来的,并不是对文科某些“边缘功能”的替代,而是在重新划定文科存在的边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科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如何应对技术挑战”,而是在一个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大量信息的时代,究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独特功能。

文科需要的是重建

如果仅仅看到冲击,而看不到由此打开的空间,就仍然停留在被动应对的层面。

AI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替代与压力,它同样在重新配置知识结构,也在为文科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当基础的信息获取与文本生成变得更加容易之后,文科反而可以摆脱对“信息处理”的过度依赖,从而把重心转向更为核心的领域——问题的提出与意义的解释。

换句话说,当机器越来越擅长“回答”,人类反而更需要学会“提问”和“提出问题”恰恰是文科最深层的能力之一。一个社会可以拥有大量答案,但如果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些答案就很难被正确理解与使用。技术可以不断生成内容,却无法判断哪些问题值得被提出,哪些解释更有意义,哪些判断更为合理。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科的价值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凸显。与此同时,技术本身也在为文科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大规模文本分析、数字档案重建、跨文化数据比较、知识网络可视化等方法,使文科研究能够在更大尺度上展开。过去依赖个体经验与有限材料的研究,现在可以在更丰富的数据环境中进行验证与拓展。

这意味着,文科并不是被技术取代,而是进入一种新的形态:既保留对意义的解释能力,又具备更强的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技术不断扩展的社会中,人类对于价值、伦理、文化与历史的理解需求,并不会减少,反而会持续增加。

AI可以提供答案,但它无法回答更关键的问题:这些答案意味着什么?它们将把我们带向何处?而这正是文科长期

承担的任务。

因此,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文科是否重要”,而是文科能否以新的方式重新承担这一任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谈论文科不应停留在辩护层面,而必须进入重建层面。这种重建并非对文科使命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对其实现方式的全面更新。在我看来,文科的重建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从知识传授走向思维训练。在信息可以被技术迅速获取的时代,单纯的知识讲解已经难以构成大学教育的核心。文科教育更重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如何阅读复杂文本,如何理解多重观点,如何在不确定情境中形成判断。换言之,重点不在于“记住什么”,而在于“如何理解”。

第二,从封闭研究走向公共表达。文科不能只停留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循环之中,而需要重新进入公共讨论。无论是对社会议题的解释,还是对文化现象的分析,文科都应具备面向社会发声的能力。只有当文科知识能够参与现实问题的讨论,其价值才会被真正感知。

第三,从单一方法走向技术融合。文科不应将技术视为外部压力,而应主动将其转化为研究工具。从数字人文到跨学科研究,新的方法不断涌现。关键在于是否使用技术,而在于如何在保持文科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拓展研究的边界。

我认为,这三个方向分别对应了文科的三个基础层面:教育、研究与方法。也只有这三个层面同时发生变化,文科的“自我革命”才可能真正展开。

文科的自我革命 是否意味着失去自我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文科需要自我革命”,但在随后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带有警惕意味的看法:一旦谈到“自我革命”,是否就意味着对既有传统的否定,甚至意味着文科将丧失自身的根基?

这种疑问并非没有由来。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中,“革命”一词往往带有强烈的历史记忆,它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剧烈的、断裂式的变化,甚至被等同于对旧有体系的彻底否定。因此,当“自我革命”这一说法被引入文科讨论时,很容易引发一种直观联想:所谓“自我革命”是否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甚至是一种带有“自我消解”意味的过程?

如果从更为宽广的历史与制度视角来看,这种理解就有些狭隘了。在学科发展与知识演进的语境中,“革命”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而更接近于一种结构性的重组与范式性的更新。无论是近代科学革命,还是20世纪

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多次转向,都不是对自身的消灭,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对自身边界与方法的重新界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自我革命”并不是放弃自我,而是重新理解自我。也正因如此,如果把文科的自我革命理解为“丧失自我”,那么问题本身就被错置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文科会不会在变化中消失,而是文科能否在变化中保持其核心。

而这个核心从来不在于某种固定的形式,而在于一组持续的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人类经验,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以及如何讨论价值与意义。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消失。

因此,变化的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是研究这些问题的路径,是组织这些知识的方式。从更现实的层面看,那些认为“文科无法自我革命”的观点,往往基于对当前问题的观察。例如,部分学生分析能力不足,一些教师对技术环境适应较慢,一些培养体系存在形式化倾向。

这些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问题在于:这些现象,究竟是文科本身不可改变的证明,还是恰恰说明文科已经进入必须调整的阶段?如果把这些现象理解为“文科的本质”,那么确实容易得出悲观结论;但如果把它们理解为“文科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那么结论就会完全不同。

从历史上看,大学与学科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无论是近代大学制度的形成,还是20世纪以来学科结构的多次重组,甚至包括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学科体系的调整,这些发展都表明,高等教育始终处在持续演进之中。

众所周知,今天AI所带来的并不是文科独有的挑战,而是一种几乎作用于所有学科的结构压力。理工科同样在发生方法更新,医学在重构诊断体系。只不过,在文科领域,这种变化更容易引发对“意义”的追问,因此显得更加尖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科的自我革命并不是一种例外,而是这一轮知识体系整体重构的一部分。

当然,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学科的变化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不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同步转型。往往是少数先行者率先调整路径,逐渐形成新的范式,然后在更长时间内扩展为新的共识。因此,与其说文科无法自我革命,不如说文科的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缓慢展开但不可回避的历史过程。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改变带来的不适,而是以“不可能改变”为理由拒绝改变。

在AI时代,文科既不能被简单削减,也不可能原样维持。它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放弃自身,而是以新的方式重建自身。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在于培养技能,更在于帮助社会理解自身,而文科正是这一能力的重要承担者。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文科“该不该存在”,而在于在一个被技术不断重塑的世界中,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理解人类自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文科就不会消失。但它必须以新的形态存在——不是被保留下来的旧文科,而是被重构出来的新文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

以贡献为导向 深化高校分类评价改革

■夏晓燕

当前,如何将分类评价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可持续、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亟待破解的课题。近期,国家层面就深化产教融合与评价改革作出新部署,强调构建高效成果转化体系、强化高校服务产业需求导向。

在此背景下,推动高校立足自身定位凝练办学特色,构建类型清晰、协同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关键路径。这既是对《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所确立的“分类评价”核心导向的深化,也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加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警惕分类评价 异化为新型同质化竞赛

在实践层面,分类评价已从政策理念走向区域探索。以上海为例,将分类评价结果与财政投入、项目配置等实质性资源联动,构建了以“综合改革保障度”“人才培养适配度”“社会服务贡献度”为核心的一级指标体系,并针对不同类型高校设置差异化二级指标。这类探索为全国破解评价指挥棒单一化困境提供了实践参照。

如今,分类评价在深化过程中正面临一个根本性挑战:即当评价深度嵌入行政与资源配置体系时,如何避免其从传统的指标竞争演变为围绕新分类标签的另一种同质化竞赛。若仅将分类评价视为资源调配的行政管理工具,而非激励办学特色与功能分化的制度杠杆,就容易导致高校为争取资源,盲目追逐那些被社会默认为“层次更高”的类别,从而使“分类”在实践中悄然滑向“分层”。当前,部分评价体系“重定量轻定性”“重显性指标轻长远贡献”的倾向,加之对服务国家新领域新任务的引导存在“难以量化”的局限,在资源与评价强绑定的现实中,可能强化层级排序的惯性。

问题的核心在于评价的指挥棒作用过强,而高校基于自身定位追求特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推动分类评价从“资源配置逻辑”转向“可持续发展逻辑”。

推动评价逻辑 向“功能-贡献”导向转型

要破解上述困境,根本在于推动分类评价底层逻辑的转变,即从侧重于资源分配的行政管控逻辑,转向服务于高校长远功能贡献的可持续发展逻辑。科学的分类评价应立足于识别、服务和放大不同类型高校的核心功能与社会贡献。这意味着评价理念与实践需实现三重转向。

一是从“分类排名”转向“功能增值”。评价体系应依据高校的主体使命与办学定位,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与价值尺度。其核心是建立多元化贡献认可机制,使应用型高校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培养卓越工程师等方面的贡献,能获得与研究型高校重大理论创新同样价值的价值认可,从而真正实现“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引导各类高校在各自的轨道上追求卓越。例如,评价应能清晰辨别并同等珍视研究型高校的基础理论突破与应用型高校的关键技术转化实效。

二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着力构建行业企业、地方政府、师生及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标准共建、过程共议与结果共评机制。这种多元共治的格局是破解评价标准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关键,不仅能增强评价的科学性与公信力,而且是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三是从“静态定位”转向“动态引导”。评价框架应具备充分的弹性、包容性与前瞻性。它不应是给高校贴上一个个固化的“类型标签”,而是要成为支持其特色发展与战略转型的“发展指南”。这意味着,评价体系必须为高校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探索预留空间、提供正向激励,从而真正激发系统的内生动力与创造活力,而非将其限制在既定框架内。

构建协同、开放、智能的分类评价体系

实现上述转向,需要在顶层设计中系统把握并平衡几对核心关系,并有机融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

首先,平衡“分类引导”与“体系协同”。建立评价结果与财政拨款、项目准入等资源分配之间更稳定、透明的联动机制。例如,设立由产业界专家实质性评审的应用技术研发专项,并在科研项目与学位

中国大学评论

研究生教育可有效缓解“第一学历歧视”

■李锋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专门讨论“第一学历歧视”问题。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委员就指出“第一学历歧视”歪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笔者在20多年前攻读博士期间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在2012年撰文论述了用人单位关注“第一学历”的合理性,因为“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求职者能力信号。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与此同时,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学位类型日益丰富的情况下,“第一学历歧视”如果大行其道,显然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用人单位重视“第一学历”有其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第一学历歧视”又不同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怎样才能缓解其中的矛盾?为此,笔者团队近期专门分析了“第一学历”对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网络和学术产出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可能有助于解决上述矛盾。

我们的研究有如下发现。其一,科研工作者的本科院校层级对其核心期刊论文产出和参与正规学术团体的数

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本科毕业生非精英高校的科技工作者而言,本科毕业生于精英高校的科技工作者的高质量学术产出更多、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其二,学术社会网络不足是导致本科毕业生于非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科研产出处于劣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他们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学术社会网络,其在学术发表上就可以赶上本科毕业生于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其三,本科毕业生于非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可以通过提升教育层次的方式,弥补先前高考相对失利对于学术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即可以通过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努力,在学术社会网络方面实现“逆袭”。

上述发现说明“第一学历劣势”的确给自身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类负面影响可以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进行弥补。这表明用人单位重视“第一学历”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一刀切”地进行“第一学历”筛选,则是万万没有道理的。因此,用人单位在人才选拔和资源配过程中,要避免“第一学历歧视”,打破其带来的“路径锁定”,提升人才使用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如果说用人单位的举措是缓解“第一学历歧视”的需求侧改革,从研究生培养机构出发采取的举措则属于一种供给侧改革。

首先,研究生培养机构有必要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的在读学生主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扩大学术网络的接入渠道。已有大量文献表明,在学校期间获得的组织社会资本对未来求职乃至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生培养机构应为本科阶段院校层级较低的研究生提供更多平台和资源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术团体、跨机构项目、学术会议与校友网络等,以促使他们主动构建更多的组织社会资本。

其次,发挥研究生阶段导师学关系的桥梁功能,助力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的研究生积累社会资本。我们的研究发现博士生阶段的院校层次对学术社会网络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导师学关系不仅能减轻研究生的科研压力,导师的学术网络还能显著拓展学生的学术社会联系。因此,应通过完善导师评价体系,鼓励“良师益友型”导师学关系等方式,推动导师在学习、学术指导之外主动

促进学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尤其鼓励导师关注来自非精英高校本科背景的研究生,帮助其在研究生阶段完成社会资本的“逆袭积累”。

最后,建设公平包容的学习、学术环境,从文化上消除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研究生的“羞耻感”。研究生培养机构应倡导“奋斗导向”而非“出身导向”的学风文化,让研究生勇于在劣势者能够保持乐观与自信,相信自身能够通过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努力实现赶超,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愚公移山”精神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重要财富,很好地诠释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需的韧性,而“第一学历歧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精神的消解。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多个方面破除“第一学历歧视”给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需要制度上明确,在就业、招生和提拔等环节杜绝“第一学历歧视”,更要在人才成长的漫长道路上打破路径依赖,倡导英雄不问出处,宣扬“驍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以及“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教授)